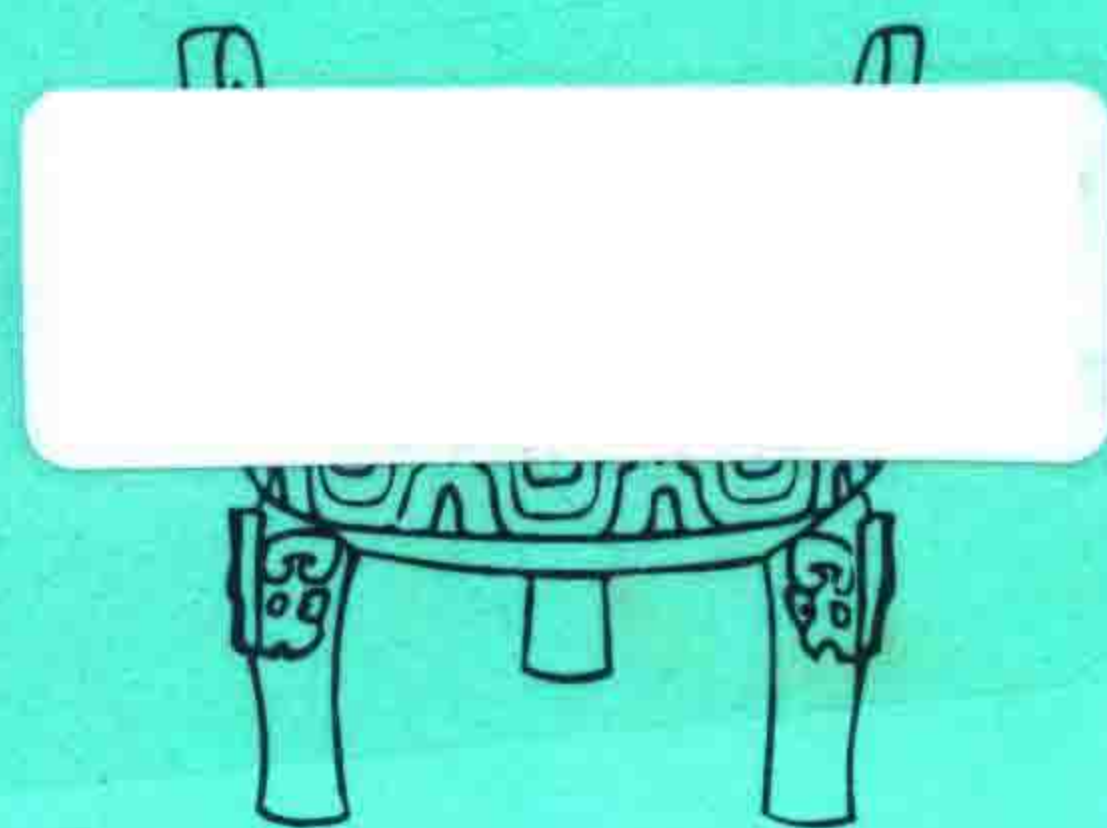
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方勇 主编

庄子

方勇 评注

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方勇 主编

庄子

方勇 评注

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/方勇评注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8

(诸子现代版丛书)

ISBN 978-7-100-15753-7

I. ①庄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
注释 IV. ①B223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4463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庄 子

方勇 评注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753-7

2018年4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21 $\frac{1}{8}$

定价:75.00元

诸子现代版丛书

学术顾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李学勤 陈鼓应 陆永品

钟肇鹏 卿希泰 傅璇琮

主 编 方 勇

策 划 厚艳芬

总 序

方 勇

春秋战国之际,王道衰微,诸侯异政,礼乐崩坏,事不稽古。其间诸子,究际天人,异说郁起。老庄述道,孔孟言礼,墨翟执俭,申韩持法,其余诸家,亦各申己见,激辩争鸣。承流而枝附者,不可胜计,诸子之学,勃然而兴,诚为中华文明之活水源头。

自汉武改运,百家罢黜,儒术独尊,然子学一脉,承传绵延,代有兴发,不绝如缕。清末民初,旧政易制,西学东渐,儒学独尊地位不再。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钱穆、吕思勉、冯友兰、于省吾、严灵峰诸君,各奋勤智,推究诸子,彰明百家,子学重现繁荣之貌。方今之世,政通人和,文运昭回。学界同仁,秉承诸子精神,整理诸子文献,述道言治,持说论辩,子学全面复兴之势,不可遏抑。

子学之全面复兴,其要有四:一曰整理文献;二曰精研学术;三曰传承精神;四曰推广文化。四要之中,整理文献奠其根基,精研学术掌其主干,传承精神运其枢纽,推广文化辅其侧翼。夫四要者,方今学者所推重者也。学界群贤,或专治一要,或数要并攻,各逞高论,共襄复兴之盛事。《诸子集成》《无求备斋诸子集成》《子藏》等子学文献整理丛书相继刊行,子学文献之整理愈发扎实厚重。《诸子学刊》《管子学刊》《老子学刊》《孔子学刊》《诸子研究丛书》等子学研究丛刊、丛书亦渐次问世,持续推动子学研究向纵深

发展。合而观之,当代子学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,均有长足进步。然子学精神之提炼传承、子学文化之普及推广尚显薄弱。子学精神者,曰人格独立、精神自由,学派之间平等对话、互相争鸣,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,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之精神也。子学精神贯穿历代子学发展之始终,实为诸子学说流衍之内在动力,乃子学承传延续之真脉。新时代之子学,当以承传发扬子学精神为己任,推陈出新,彰显当代子学之风标。再言子学文化之推广:诸子持论迥异,流派分明,各有传授,加之世事时局之影响,虽源远流长,却多持于士大夫、文人学者之手,并未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然则诸子之学,本非束之高阁、囿于书斋之案头学术,而实为导世化俗、作用当下之实学。子学研究若清谈理论,不能化为时用,纵汪洋恣肆,亦难免于空疏之责。是故当代之诸子学术,务期以昌明国法,启蒙民智,摧邪辅正,去伪存真。故曰推广子学文化为子学复兴之辅翼,不可或缺。唯有深度与广度之二维拓展,方可引领子学之全面繁荣。

方今时代,与先秦相类,文化多元,议论蜂起,传统与革新同在,危机与机遇并存。固守传统、推尊一家,已难以独擅学林。传统文化、学术之转型,势在必行。由是,根植传统文化沃土而离脱旧学窠臼、融通中西思想方法而延续民族真脉之“新子学”应运而生。“新子学”之时代任务有三:一曰提炼并弘扬子学精神。以子学精神为导引,方可重拾独立、自由、平等、共生之优良传统,进而消解旧学专制、偏激、排异之流弊,从而锻造当代多元、会通之学术、文化。二曰重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。“五四”之际,旧学统治崩塌,除旧立新之声四起,加之西学涌入推助波澜,新文化运动席卷

中华大地,是故中国传统学术承传递嬗之脉络暂告中断。学界多依傍西学体系,以期重构中华学术。《诗》归文,《春秋》入史,《论》《孟》归哲。就其形式而言,可谓大致实现传统到现代之转型。得益于此,中华学术亦得以挣脱桎梏,获得长足之进步。然就其实质而论,中学之血脉未能全合西学之骨络,使现今学术,表里不一,精神尽失,不能与西学平等对话,于世界范围几近失语。揆诸当今形势,中华文化之复兴,既要植根于传统,又须着眼于世界。其话语体系之重构,迫在眉睫。诸子之学,凝聚先人智慧哲思,为中华文化学术之源头,民族话语系统之柱石。“新子学”脱胎于传统子学,兼有融通中西之思想、契合当前再造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要求,当成为革新学术、重塑精神之中坚。三曰全面复兴子学,引领当代之国学。先秦之际,百家之说虽隐显各异,实则无高下之判。汉武推孔氏,黜百家,遂有经子之分野。传统国学,以经学为主导,因循守旧,排斥异端,以致抱残守缺,丧失创造革新之能力。“新子学”力主退经还子,全面复兴诸家之学,由此构建兼容经儒、并包诸子之开放体系,缔造包罗万有、生生不息之崭新学术,引领当代国学之发展走向。近两年间,学界先后数次召开高端学术研讨会,问脉“新子学”,有关“新子学”之议论亦持续升温。讨论日趋深入,“新子学”亦渐入人心,其理念、体系、方向已获学界多数朋友认同。“新子学”已崛起为当代主流学术之一。革新传统子学,缔造全新学术亦由此成为当前子学发展之风向标。恰值此时,商务印书馆欲刊行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,此举无疑顺应时代之要求,符合子学发展之规律,与“新子学”之理念不谋而合,实为复兴诸子之学、弘扬百家文化之新鲜血液。

20世纪以来,子学著作之整理成果颇丰。《诸子集成》《新编诸子集成》《诸子集成续编》《诸子集成补编》《无求备斋诸子集成》等大型丛书先后推出。《子藏》前两批成果之面世将子书整理推上另一高峰。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亦选入部分子书,另有某子之注译、选译单行本等等。就当前成果而言,《子藏》等大型丛书固然体系宏阔、内容丰赡,然其以整理元典为要,以保留子书原貌为先,文献价值虽高,却因语言古奥不利于大众之接受。今人之注译、选译,化繁为简,变古为今,易传播于当今,然各成一家,不成体系,标准不一,良莠不齐,恐有泥沙俱下、以讹传讹之虞。由是看来,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出版,顺时应势,甚为必要。该丛书精选诸子百家之善本,全面注译原文。子书以刘勰所谓“诸子者,入道见志之书也”为标准择选,即诸子为诸子百家之子,而非经史子集之子。诸子之涵盖范围循章炳麟《诸子略说》之言,即“所谓诸子学者,非专限于周秦,后代诸家,亦得列入,而必以周秦为主”。另,篇首设题解,篇尾设评析,前后呼应,解读通篇大意,论析主要观点,导引读者接受。丛书全注全译,博采众长,简明晓畅,务求变古奥为浅近,化艰深为平易。题解、评析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,力争符合史实,通达精到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编成,文献价值与可推广性兼而有之,对当代子学之复兴与繁荣必有强劲之推动作用。

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编撰宗旨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,振兴中华民族精神。该丛书就文献价值而言,择选版本精善,体系构建谨严,持论平允适当,与《子藏》等诸子丛书相类,当成传世之经典。就其学术价值而言,立足于经典传承,着眼于文化普及,揭百家之面纱于众生,显诸子之精神于当世,使诸子当下之学之本质得以回

归,大利于子学之普及与推广,无疑契合子学全面复兴之要义。就其现实意义而论,创新学术,彰显时代之风标,有益于大众对民族文化之认同,亦有益于提升华夏文明之世界影响与地位,从而助力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之重构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面世,得益于学界整理诸子文献,创新百家学术之长期积淀,《诸子集成》系列丛书、《子藏》《诸子研究丛书》、“新子学”等均为其提供了丰富滋养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之成书,亦是子学转型发展之必然,从传统到现代,自精英及大众,由封闭而融通,预示着当今子学发展已步入“新子学”阶段,子学之全面复兴,势在必行。

一人之立,尚需精神;一国之立,何能无精神而自行?耽于功利,惑于途说,大言炎炎,小言詹詹,所谓中国者竟何谓乎?诸子百家之学,源远流长,承传绵延两千余年而不减其泽,实为中华文化与精神之活水源头。当今中国之崛起,民族之复兴,实应以精神之回归、文化之传承为保证。归根返本,正本清源,正待其时。当代诸子之学,当汇纳百家以成不朽,淘沙取金以锻精神,引领文化、学术之走向,助推民族、文化复兴之实现。《诸子现代版丛书》为当代诸子学之力作,必将于未来之学术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,成就一代之经典。

2014年9月15日

导 言

一、庄子其人

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,其生前默默无闻,死后也长时间少人问津,家世渊源、师承关系、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。在战国时期的人物中,除了荀子在《解蔽》中有“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”的批评之言外,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,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。后世了解庄子,主要是通过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及《庄子》一书。《老子韩非列传》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,但目前看来,这是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,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;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,则大部分要来源于《庄子》一书。

庄子姓庄,名周,除去《汉书》为避汉明帝之讳有时称其为“严周”外,世人皆称其为庄子或庄周。但是庄子的字却直至很晚才出现,隋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在“姓庄,名周”下注曰:“太史公云:‘字子休。’”但现在所见《史记》中并无此说。此外,唐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序》、司马贞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索隐也提到庄子字子休。可见,庄子字子休的说法大约到唐代才出现或流行开来,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,这种说法的依据还不得而知。至于

庄子正式号“南华真人”，是始于唐玄宗，但梁代梁旷著《南华论》，以及唐初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序》中，已经称其为“南华”。“南华”这一称号的来历说法不一，北宋陈景元在《南华真经章句音义》中认为是取“离明英华”之义，清宣颖在《南华经解》中则认为这是由于庄周曾隐于曹州的南华山之故。

根据司马迁的记载，庄子是“蒙人”，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“蒙”。《庄子·列御寇》中说庄子居宋，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。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索隐引刘向《别录》：“宋之蒙人也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高诱注：“庄子名周，宋蒙县人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庄子”班固自注：“名周，宋人。”张衡《髑髅赋》：“吾宋人也，姓庄名周。”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，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，便认为庄子为梁人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等，即有这样的说法。

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，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，缺乏确凿证据，已无法考证，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说庄子“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”，又说“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”，那么庄子应当大约与梁惠王、齐宣王、楚威王同时。近人马叙伦《庄子年表》据《庄子》中对魏文侯、武侯都称谥号，对惠王则是先称其名，又称其为王，从而推断庄子出生于魏文侯、武侯之世，最晚也在惠王初年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庄子所处的年代，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，战争频发，生灵涂炭；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，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，“士”这一阶层的人大量涌现。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

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,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,墨家门徒遍及天下,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,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“无用”和贫困。《庄子》中描述他身住陋巷,以织草鞋为生,饿得形容枯槁,面孔黄瘦,受人讥嘲,有时甚至还得向人借米;见魏王时,他也只是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,踏着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。但《秋水》篇、《列御寇》篇中都曾描述他断然拒聘的故事,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也曾记载楚威王欲聘庄子为相,庄子却表示“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,无为有国者所羁,终生不仕,以快吾志焉”。虽然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庄子门徒为抬高庄子地位而杜撰的,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庄子超然世外、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风度,以及视富贵荣华如敝屣的生活态度。

庄子也曾经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,但绝非出于他的主动选择,可能只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说“周尝为蒙漆园吏”,关于“漆园吏”的说法不一,据推测可能是专管种植漆树的小官。《庄子》书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产和使用,如《人间世》篇“漆可用,故割之”,《骈拇》篇“待绳约胶漆而固者”。此外,《庄子》书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,值得注意,如《养生主》篇“庖丁解牛”,《人间世》篇“匠石之齐”,《达生》篇“梓庆削木为鐻”等等,这说明庄子是比较熟悉当时下层工匠劳动情况的。

庄子向来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”(《天下》),因此与之来往的朋友极少,即使有门徒可能也数量不多,正如朱熹所说:“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,他只在僻处自说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五)但也有例外,便是惠施,他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契友,《徐无鬼》篇中讲“庄子送葬,过惠子之墓”,不禁感伤,以“匠石运斤”的故事表达

自惠子死后,自己“无以为质”“无与言之”的寂寞心情。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庄子,却对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遗憾,足见二人情谊之深。但是庄子与惠施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距离,在学术观点上也相互对立,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上,这些辩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:“大而无用”(《逍遥游》)的争论、“人故无情”(《德充符》)的争论、濠梁“鱼之乐”(《秋水》)的争论。这些辩论对于理解庄子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,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认识的态度上的显著不同: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,因此更富有艺术家的风貌,而惠子则偏于知识论的判断,因此带有更多逻辑家的个性。

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,“其学无所不窥,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余万言,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《盗跖》《胠箧》,以诋訾孔子之徒,以明老子之术”(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)。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,而是有其独自见解,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、艺术特色。

二、《庄子》其书

1. 概貌

《庄子》应该于先秦时期就已成书,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十三篇本《庄子》,是经西晋郭象删订而流传下来的。汉代《庄子》有五十二篇十余万字,这种五十二篇本到魏晋时期仍然可以见到。魏晋时玄风盛行,庄学渐起,为《庄子》作注者多达数十家,但这些注庄者往往根据自身对庄子的理解和个人喜好,对《庄子》一书的篇

目做了一定的删改,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《庄子》版本。郭象以前,主要的《庄子》版本有崔譔本、向秀本、司马彪本。其中崔譔、向秀本为二十七篇(向秀本一作二十六篇,一作二十八篇),司马彪本五十二篇。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郭象三十三篇本,是郭象在五十二篇本的基础上,吸收各家尤其是向秀庄子学成果之后删订的,是郭象对司马彪五十二篇本“以意去取”,删去其中“十分有三”之后的结果。经过郭象删订的《庄子》,无论从篇章还是字句方面,都更为精纯。由于他吸收和借鉴了向秀及当时各家之注,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颇富改造性的独特诠释,故为历代所推崇,逐渐成为定本,流传至今。

今本《庄子》有内篇七、外篇十五、杂篇十一,这是由郭象划定的。但在郭象之前,就已有内、外篇或内、外、杂篇之分,且篇目构成上与郭象本不尽相同。崔譔、向秀本《庄子》仅有内、外篇,无杂篇。司马彪注《庄子》时,将《庄子》原文明确划分为内、外、杂篇三个部分,之后郭象在司马彪本的基础上删订时,又将外、杂篇略去部分篇目,并将某些篇目的段落进行了重新裁取整合,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《庄子》面目。各家对内篇的意见比较统一,无论注者如何“以意去取”,“其内篇众家并同”(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),这不止表现在数量上,也表现在具体篇目上,其原因可能与内篇在标题、风格、内容上都比较一致有关。而对于外、杂篇,各家则根据喜好,进行了或大或小的删改。至于划分内、外、杂篇的依据和标准,则众说纷纭,未有定论,主要有根据文意之深浅、风格功用之不同和标题有无寓意来划分等观点,但都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。

2. 篇目的真伪

《庄子》篇目的真伪问题在宋代苏轼以后才为人们所关注。郭象将五十二篇本删订为三十三篇本时,就已有去伪存真的目的,从而删去那些“一曲之才,妄窜奇说”(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)、不足为信的部分。陆德明也赞成此说,认为《庄子》经“后人增足,渐失其真”(同上)。但是,郭象与陆德明以是否为庄子亲作来分辨真伪,显然是不合理的。先秦诸子著作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墨子》等,多为弟子记录先生言行或由师徒共著,后学续笔发挥也是常有的事,因此,《庄子》在庄子亲作之外,还包括了其弟子或后学的部分著作,这也是正常的。并且由于庄子学派逍遥无拘、汪洋恣肆的思想与文学特点,庄子后学极可能对《庄子》内容不加拘束地自由发挥,由于时代及社会状况的限制,其中有些或许比较贴近庄子原意,有些则可能偏离较多,这也很好理解。因此,在辨别《庄子》篇目真伪之时,必须首先将其作为整体的庄子学派思想的汇集,而不应过分着眼于单个篇目的真伪校定。

郭象删订《庄子》时,可能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,因此许多明显并非庄子本人所作的篇目或段落,也收入了郭象三十三篇本中,从而引起了后世对《庄子》真伪问题的继续讨论。如宋苏轼在《庄子祠堂记》中,明确提出《盗跖》《渔父》《让王》《说剑》四篇为伪作,一方面认为庄子“盖助孔子者”,故而以是否“真诋孔子者”为真伪标准;另一方面以文风及思想深度为标准。之后的许多学者进一步考察《庄子》的其他篇目,怀疑之说日多,主要集中于外、杂篇,外、杂篇多伪作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。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更将怀疑的眼光扩大至内篇,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和证据。

三、庄子的思想

1. 宇宙观

庄子说：“有实而无乎处者，宇也；有长而无本剽者，宙也。”（《庚桑楚》）郭象解释说：“宇者，有四方上下，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；宙者，有古今之长，而古今之长无极。”可以看出，庄子认为“宇宙”的概念是无始无终、无边无垠的。那么“宇宙”的根源又是什么呢？庄子将其归结为“道”。在庄子看来，人的感性和理性所能感知、推测的事物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性与有限性，生死、贵贱、大小、是非、善恶、美丑、荣辱、得失等等，都是人们心中的成见，是人们被自己有限的认知能力所蔽而导致的：

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

（《德充符》）

物故有所然，物故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恠憭怪，道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；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……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；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天。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（《齐物论》）

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，果且无彼是乎哉？（同上）

庄子认识到了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差异，并且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，因此不可能以某个特定存在的标准来衡量世间万物。庄子认为这种相对性来自于人类自身的种种局限，因为世

间万物本没有差别,所有的差别都是人们站在主观立场上得出的相对结论。但是他同时又肯定,虽然事物存在着相对性,但对立的双方又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,是不可以完全消除的:

彼出于是,是亦因彼,彼是方生之说也。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。方可方不可,方不可方可。(《齐物论》)

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。(《秋水》)

这种相对主义主宰了庄子对于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等各个领域的认识与理解,但也必然将他带入不确定的混乱之中,于是庄子虚构了一个空虚的绝对——“道”,来消除这种相对性带来的不确定性,认为不论世间万物有如何的差别,一旦站到更高的“道”的角度去审视,这种种差别都将消失不见。他在《秋水》篇中借北海若之口说:

以道观之,物无贵贱;以物观之,自贵而相贱;以俗观之,贵贱不在己。以差观之,因其所大而大之,则万物莫不大;因其所小而小之,则万物莫不小。知天地之为稊米也,知毫末之为丘山也,则差数睹矣。

就是说,虽然事物之间没有特定的标准来彼此衡量,但只要将万物都归结到一个统一的本原,即“道”之中,就没有了任何的差别,“道”在这里成为了一个绝对的标尺。

庄子是这样给“道”下定义的:

夫道,有情有信,无为无形;可传而不可受,可得而不可见;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;神鬼神帝,生天生地;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,先天地生而不为久,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(《大宗师》)

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,道“有情有信”“自古以固存”,说明是客观